

## 略论报告文学的政论特征

余文秀

近几年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促使关于它的理论研究空前地活跃起来，它作为新闻文学不同于艺术文学的特征以及诸多写作问题，引起人们广泛探讨的兴趣。其中真实性是讨论最为热烈的课题，其它如文学性，甚至典型化问题，也日渐为人们所关注，并正在进行逐步深入的探讨和给予科学的理论说明。这些研究，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无疑地将起着推动的作用。然而体现报告文学独特战斗风格的政论性特征，至今却鲜为人专门论及。可是几年来我国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有着鲜明的政论色彩。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在评及我国第三届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时甚至说，抒情和议论近些年来在报告文学中运用得越来越多，“我怀疑它几乎造成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代文风”<sup>①</sup>。毫无疑问，创作实践又一次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报告文学的政论性特征？政论对于报告文学有什么特殊功用？报告文学政论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笔法究竟怎样？政论文笔与报告文学家的素质、修养的关系如何？本文打算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浅见。

诚如茅盾先生所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报告

文学之具有政论性，首先是时代使然，是一定历史时代产生的特殊文学样式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因为“刻刻在变化的现实要求着斗争意识强烈的作家们采取最快和最直接的方式来加以反映和批判（着重号引者加）。”<sup>②</sup>作为脱胎于报章新闻的报告文学，先天的和现实生活、社会政治、民众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诞生在民众血与火的激烈政治搏斗之中，它一问世，便和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有着血肉的关联。我国早期的优秀报告文学几乎都是诞生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硝烟里，生活的激流中。阅读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1926）、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刘志清（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1930）等作品，感受到的绝不是作者个人的小小悲欢，而是一股股阶级大较量的火药味，是报告者充满正义感为革命大胆呐喊、勇敢抗争的无畏气概，是一种催人奋起、投身斗争漩涡的强大力量。处于急剧变化而又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年代，一般地抒情写物吟咏风月的作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时代感强烈、政治倾向鲜明的报告文学便从散文中脱颖而出，应运而生。事实有力地说明，报告文学是战斗的文学，报告文学作者是战斗者，他不仅用笔报告斗争生活，并且亲身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正如苏联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波列伏依所说，他们“几乎总是

以被描写事件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出现。<sup>③</sup>”一个战斗者在斗争中总是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的，而一旦形诸文字，也必然会流露出他对事物的臧否和评价。我们从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俄国社会各阶级动态的精辟评论，从夏衍的《包身工》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残酷压榨包身女工野蛮罪行的无情揭露与批判。报告文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同现实生活结成的天然联系，报告文学家对民众斗争强烈的社会感情，铸成了它的政论性的特征。

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必须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创作原则，因为这是它和一切艺术文学的根本分野。然而严格的真实性从某个角度又恰恰限制了报告文学作者，使他难以描述出如小说那样曲折完整的故事、丰满典型的形象，难以将其创作意图表达得如小说那样完满。可是在素材先天不足的时候，“作者无权去杜撰填充”，于是他“只能求助于抒情、议论去推动”<sup>④</sup>。他不得不站出来，发表议论，抒写主观感情，表明其政治倾向。试想想，如果《包身工》的结尾没有“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那段预示未来光明前景的议论文字，作品总的政治倾向将会怎样？恐怕将会因为没有能够展示出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而存在明显的思想局限吧。然而夏衍毕竟是一位革命的作家，一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又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向的。因而他用象征寓意，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渴望的社会理想。著名的报告文学评论家T·巴克锐敏地发现了报告文学这一特点，并作出了如下论断：“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sup>⑤</sup>科学地总结了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的这一个性特征，完全符合报

告文学的创作实践。

中外著名的报告文学家不仅其作品多有鲜明的政论特色，而且他们还对报告文学这一创作特征作过一系列的概括和说明。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的高尔基就曾总结说：“大多数特写（注：此处即指报告文学，下同）充满了政论色彩。”<sup>⑥</sup>他肯定那些有成就的特写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对生活只作机械复制的“摄影师”，而是“把许多‘属于自己的东西’写进了所描写的事物中。”<sup>⑦</sup>他还指出：“特写是介乎研究性论文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作品”<sup>⑧</sup>，揭示了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与作为艺术文学的小说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区别。波列伏依也曾说：“特写作家时常对自己所描绘的事件作出直接的评价，……他们政论式地揭示了特写的思想并强调了它的意义。”<sup>⑨</sup>这不仅指出了报告文学的政论特征，并且更进一步地点出了政论对于报告文学的作用。无独有偶，我国著名的报告文学家刘白羽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特写“作者在描写生活现象时，还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印象、意见，加以评论，它没有小说的严格限制，作者可以‘见景生情’地、直接地帮助读者更确切地认识事物，得出结论。”<sup>⑩</sup>著名报告文学家黄钢也说，他的报告文学中经常揉合文艺性政论的因素，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偏好，而是“由于表达实际生活和进行实际斗争的需要。”<sup>⑪</sup>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郭小川在谈及报告文学的议论时，不仅明确肯定它的必要，而且还从追溯历史渊源的角度论证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他说：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讲道理”，还是“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讲道理”，那都是“古已有之的”<sup>⑫</sup>。由此看来，毋庸置疑，政论性是随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与生俱来的，为中外报告文学家一致确认的一个重要特征。

政论在报告文学中的作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事实作情理铺垫。向读者报告事实，是报告文学的根本任务。然而事实的报告要能获得感人的艺术效果，高明的作者通常不执着于事实本身，而善于施以各种侧面的表现。通过政论式的抒写，先从情感和理智上激发读者的某种审美情趣和欲望，然后再进入事实，这便是对事实所作的一种情理铺垫。这种由虚到实的政论式的抒写不仅吐露作者对生活的特有感受和认识，也唤起读者对审美对象的关注和思索，使作品的艺术魅力远远超出孤立地叙写事实本身。它一般放在事实的报告之先（有时是主体事实、有时则是某一具体材料）。铺垫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获奖作品《三门李轶闻》在向人们报告那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三门李生产队的群众在自愿组合作业组时竟将本队的五个共产党员全部摒弃不纳——之前，先写了这么一段精彩的文字：这是“一件很小的又是很大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同凡响的，乍听之下似乎出人逆料、细细想来却又尽在意中的事”。作者以凝重而又略带苦涩和幽默的笔调写了他对所报告的事实的感受和评价。一连串表面看似互相矛盾，实则对立而又统一的词语排列在一起，扑朔迷离，意味深长，一种朦胧之感立即唤起读者阅读欣赏的兴趣。这样的铺垫，无论对于启导读者还是揭示事实的思想内涵，显然都是有益的。

二，突出事实新闻意义，升华作品主题。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所报告的事实不仅应该是真实、典型的，而且还须具有新闻价值，要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性，能迅速反映生活的新动向和新信息，提出并

回答人们关注的问题，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进而推动生活前进。这也是报告文学选择题材的一项重要原则。报告文学的新闻意义，首先应该通过对事实所作的生动报告来表现。恩格斯所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出来”<sup>⑬</sup>，对报告文学同样适用。但报告文学毕竟不是小说，它并不排斥作者抒写自己的主观感受，甚至直接站出来对生活作某些“指点”。作为报章体裁的新闻文学的作者，站出来对生活作必要的“指点”，一般地说读者不会反感，如果“指点”确有见地，读者往往还会对那些精言妙语饶有兴味，甚至产生感情共鸣，获得一种“茅塞顿开”或“正合孤意”的快感。这不管从读者的审美感受还是得到的理智启迪来说，都有积极的意义。这种政论，一般出现在事实报告之后。阅读《还是那双眼睛》，谁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王震同志对知识分子挚诚的爱所感动？但作品绝不是在表现一位将军和普通“文化人”的个人私交。作者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对性格粗犷的王震将军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与感情的时代意义，作了透彻的揭示和个人评价，指出这是一种大将的“战略眼光”。请看这样的文字：

纵观历史，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王震在自己的长期实践中认识到这个真理。共产主义是以消灭三大差别为目标的。无论士农工商，无一例外，都要进化为知识分子，这是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王震将军虽然是工人出身，少时没念多少书，却从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领悟到这一点。

这段议论，既有作者对事理的认识，也找准了支配王震一系列行动的思想支点。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知识分子的历史作

用；以这种“战略眼光”来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而这也正是这篇报告文学的认识价值和新闻意义之所在。不仅止此，它又何尝不是革命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历史向人们提出的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重大课题呢？作者精辟的政论，点明了笔下典型的现实意义，升华了作品的主题，突出了作品的时代性，也帮助读者去深刻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

三，触类感发，干预生活。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主时代的主导思想和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品就是僵化的东西。”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尤其是如此。报告文学是勇敢者的事业，报告文学作者本身是为美好事物而抗争的斗士，他常常比一般人更为灵敏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息。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使他的笔既讴歌生活中的真善美，也讨伐邪恶，针砭时弊。他以生活主人的身份介入火热的斗争，用清醒的头脑和火热的爱憎探究和思索现实与人生。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对事实的报告触类感发，产生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大胆提出生活中的问题并公开表明自己对是非的评判和对人生的态度。新闻文学的现实针对性、战斗性和倾向性，常由于这种政论而得以突出和变得鲜明。尤其当报告文学家生活于民主的政治空气之中，面对转机纷呈的时代，沐浴着思想解放的阳光，干预生活进而改造生活的激情更促成这种政论的发展。近几年我国优秀报告文学中不少脍炙人口，振聋发聩的政论文字，常使作品添色生辉。它们开启读者的心智，激发人们变革现实的勇气和热情，发挥着艺术文学难以企及的社会作用。阅读刘宾雁、陈祖芬、黄宗英、柯岩等作家的作品，便会突出地感受到这种思想力量。

四，断续过渡，前后挽接。这是政论在

报告文学结构上的作用。但它不是孤立的，常与上述诸种情形结合而兼起过渡挽接的作用。严格的真实性使报告文学难以做到故事情节的完整和曲折，但新闻文学的文学性又要求它具有一定的情节吸引力，于是作者的艺术构思便显得十分重要。他犹如面对一块原始材料的根雕艺人，必须反复琢磨，随圆就方，最后雕刻出具有美感魅力的艺术品。施用政论断续过渡，前后挽接，便常常是实现作者总体艺术构思的一个有机环节。《扬眉剑出鞘》写栾菊杰于决赛前小憩醒来悄悄地把自已的美好心愿（“我想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告诉翻译后，接着有一段带感情的议论：

激战前运动员的心里，仿佛奏起一支奇妙的乐曲。回荡在她心中的既有轻松舒展的基调，又有激越高亢的旋律，摆脱了个人胜负的羁绊，喷薄着为国增光的热忱。运动员的心里响起这样的和弦，就处于最佳竞技状态。

这节文字，既表达作者的感受和对人、事的评论，结构上也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叙述由“断”到“续”，接上“决赛”的情节主线。作品接下去立即写“竞技”——“晚上七关，决赛开始。”这里用政论过渡搭桥，便显得十分自然熨贴。

五，曲折达意，避其不得不避。这有时既是斗争的需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婉曲之笔。我国当代报告文学家在谈其创作甘苦时对这一点多有涉及。理由就曾说过：“在文有所忌的时候，回避了生活中的具体所指，用抒情、议论来代替。”◎阅读柯岩的《癌症≠死亡》、陈祖芬的《共产党人》，这种通过议论“曲折达意”的创作意图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不过“曲折”是为了“达意”，讲究斗争策略有时是必要的，但须警惕不要磨掉了报告文学干预生活的战斗锋芒。

报告文学的政论抒写，不同于以说道理为宗旨的一般政治论文。它只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和褒贬爱憎的一种表露。其具体形式及文笔常因报告内容的不同和报告者创作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各呈不同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事理交融式。报告者既报告事实，在描述事实的过程中又夹杂着对是非的审美评价和主观爱憎的抒发。这种形式贵在融理于事，事理交织，事实的报告应是基础与前提。只有事实本身能够激起读者感情和理性的波澜，对事实的评价与感情抒发才会有动人的力量。世界著名报告文学大师埃贡·埃耳温·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南京和红军》一文便通篇具有事理交织的特点。作品报告的基本事实是：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的南京城中山路，连续过了好几个小时全副武装的部队。这支队伍是半年以前在上海迎战过日本侵略者并让日本人止步不前的十九路军。如今经过整编，按照蒋介石聘雇的德国军官的指示，被训练得服服贴贴，正要开去攻打中国的苏区和红军。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而那里正在进行和平建设，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统治，没有外国人，没有鸦片，没有私人银行，没有童工，没有儿童贩卖，没有传教士，没有内地关税，没有土匪将军，没有暴徒，没有贿赂。

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客观叙写，细细品味，却渗透着作者倾向鲜明的社会感情，他让人看清以蒋介石为总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派剿共媚日的卖国本质，看清这支不义之师的首脑们彻底背叛孙逸仙三民主义的叛徒嘴脸。

二，蕴理于情式。这通常是一种抒情式政论。报告者对所描述的事实情有所动，于是

不自禁地写下自己的内心感受与情怀。采用这种政论重要的是理真情挚，诗情哲理相生，作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则动情感人，耐人回味。《癌症≠死亡》的笔者柯岩作为癌症嫌疑犯在住院就医期间深入到北京紫竹院癌症气功班，深深地为那里的“老癌们”的乐观精神所感动，写了他们同死神顽强角力的动人事迹。作者接着动情地抒写了这么几段议论：

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我不禁一连退后了几步，以便能更好地打量这一群，这一群被癌的王国无情地判处了“死刑”的囚徒；一群被死神紧紧扯住衣襟的俘虏；一群在凡人眼里的活死人！

但他们却又是癌的王国不停抗争的叛逆；一群千方百计打破囚笼的勇者；一群用殊死的角力，一分一秒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的角斗士；一群确是比凡人更多勇敢，更多信念，更多生气的不凡的人！

在这殊死的决斗中，他们有的已遍体鳞伤，有的即将牺牲。但他们只要有一口气，还能走一步路，他们就将继续这一场力量悬殊，几乎是无望的角力，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给未来者点燃希望的灯……

这里用诗的语言和感情高度评价、赞扬同命运抗争的角斗士，字里行间蕴含着启人深味的人生哲理。

三，象征寓意式。这通常表现为描写式议论。作者运用相似联想，选取生活中具有某种特征的物象进行具象化的描写，借以表达一定的寓意，寄托一定的情怀。这种政论，应该写得情景并茂，蕴含深厚而又具有共鸣性，能启人联想，发人深思。《大雁情》描绘在漫山岩缝中生长着的不起眼的“细草”、“小草”（野生药物“远志”的俗名），写它有着长长的棒槌般的根，能在乱石缝扎根。作者由“小草”触景生情，联想到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又融情于景，抒发了如下的议论：

……大多数知识分子——祖国浩浩荡荡的脑力劳动大军啊！他们象漫山遍野的小草，分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狂风暴雨，冰雹严霜，刀砍火伤，哪里有土地，哪里有人民，他们就在那里深深扎根。

通过“远志”草这一象征之物，寄托了作者对主人公，对中国成千上万如“远志”般的知识分子的深厚感情。

四，论辩直陈式。这种政论常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抒写的大多是对生活中一些现实问题的政治见解，针对性强。作者常由报告事实而动情兴感，不避锋芒地批判社会弊端，对人、事鲜明表态。这种政论要成功，关键是对生活要有真切感受，独到见解，所发要有的放矢，深中肯綮而又不与作品内容游离，语言还应精练明快。请看下面文字：

一个进来了，一个出去了。田凤山倒下，杨政委崛起；张志新出党，王守信入党，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能够是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吗？

——《人妖之间》

还是有人才的？仅仅“还是”？不，我们有的还是人才！但是在我们这块充满着人才的土地上，还延续着一种扼杀人才的习惯；有些掌握科学而不掌权的，得服从本单位掌权而不掌握科学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想干且不知道怎么干的。在两种对立的精神品质的阴错阳差，东拉西扯中，人才还在给消耗着……

——《祖国高于一切》

#### 四

政论，是报告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包孕着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和内在感情。要成功而有效地使用政论武器，作为审美主体的报告文学家必须加强自身素质、修养的完善和锻炼。

首先报告文学家应该成为思想家，他需

要思想政治的修养，以获得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正确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立场、观点及科学的思想方法。T·巴克曾经十分中肯地指出，在一定的限度内“决没有杰出的资产阶级报告文学家，因为在他的报告里会歪曲事实的，他的资产阶级的倾向甚至表现在题材的选取，在事物的表面停留，以及在结论的躲闪上。”<sup>⑤</sup>资产阶级报告文学家的阶级偏见牢笼了他的思想和目光，使他不能客观地正视现实，更不能对现实作出正确而科学的结论。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家要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并对之作出合乎客观规律的评价，自然首先必须具备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把握世界的科学方法。这需要长期而艰巨的修养与锻炼。大量政论成功的报告文学说明，作家睿智的目光、深邃的思想与他对世事高人一筹的识见，总是和他认识事物的正确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思想政治水平分不开的。老作家徐迟敢于冲破禁区，介入是非之地，去报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数学家陈景润，并使作品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首先就在于他对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透彻的见解和正确的评价。而这种见解与评价又来源于他所具备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以及相当的思想政治水平，来源于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革命胆略。

其次，报告文学家对变革的时代应该有饱满的诗情，这就要求他与人民同哀乐，和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共命运。报告文学家“不能够是以‘冷淡地对待善与恶’的心情从事写作的编年史家”，“只有当记者本人对我们的一切缺点愤恨填胸，只有当他本人对我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共产主义的新事物感到亲切、珍贵、衷心欢欣时，他才能竭尽其创造力，写出好的东西来。”<sup>⑥</sup>波列伏依在这里对报告文学家提出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要求。报告文学家必须和那种对生活的美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冷漠态度作无情的斗

争。要以自己的胸膛紧贴着人民的胸膛，感同身受，才能发出人民的心声。正如黄宗英所说：“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暖与冷、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苦难、光明与黑暗、美与丑……才可能换来色浓墨饱的一支笔。”<sup>①</sup>不少政论成功的报告文学佳篇的创作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说作家创作了作品，作品也创作了作家是一条客观规律的话，那么报告文学的政论，则是作家世界观的一种亮相，它常常可以窥知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窥知作家同时代脉搏、同民众心声的感应程度。报告文学家陈祖芬曾说：“要作家干什么？就是要从生活的山岩上去开掘美的泉水，给辛劳的、疲惫的人们送上一捧沁人的清泉，使人感奋起来。”于是当她看到那一个个历经磨难而依然昂扬地工作的人，她每每勃发起一种使她不能自己的热情。这种热情把她席卷起来，然后抛掷到使她激动起来的那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她便站在那个人的位置上，经受主人公所经受的磨难，关心主人公所关心的事物，思考主人公所思考的问题。而一旦当她进入“角色”，她说：“我要说的就不是我个人想说的话了，而是我所采访的人们所想的、所说的，是人们在思考、在议论的。于是我变得没有顾忌了。”<sup>②</sup>这是报告文学和人民命运与共、心心相通的密切关系的真实披露，这里涌流着作家一种极可珍贵而又崇高的感情，这种感情流注笔端，往往便形成报告文学那些极富鼓动性和震撼力的精彩政论。自然报告文学家对生活的饱满诗情还取决于他对时代与社会的了解和掌握，取决于他对生活体察的深度与广度。这更需要辛劳的社会实践及踏实而长期的修养和磨炼。

同时，报告文学出色的政论，同作者的语言、技巧修养也是分不开的。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政治论文，它的政论应该具有文学的色彩，要力求用形象化的语言，既

富诗情又含哲理，含蓄蕴藉，文采光华，有美感魅力。发议论要注意把握“火候”，不可漫无节制，遍地开花。最忌好为人师、滥施说教的空论。

文无定法。恪守陈套和定于一尊向来是创作的大忌，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应该提倡报告文学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报告文学施以必要的政论有其特殊的作用，然而不施政论并非不能产生成功的佳作。但政论既然是报告文学一个与生俱来的艺术特征，如果作者在使用艺术画笔描绘时代的壮美画卷时，涂上一抹政论的色料，那画图也许会显得更光亮夺目吧？

#### 〔注 释〕

①鲍昌《火红年代的交响音诗——评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见《文艺报》1985年5期。

②均见《关于“报告文学”》，见吉林人民出版社写作知识丛书《报告文学》。

③④⑥《论报纸的特写》，见《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第6辑合订本。

④④理由《报告文学的遐想》，见《文汇月刊》1982年8期。

⑤⑤《基希及其报告文学》，见《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3月版。

⑥《文学书简》下卷211页。

⑦《论写作技巧》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76页。

⑧《文学书简》下卷218页。

⑩《文学杂记·论特写》，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⑪《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的》，见《芙蓉》1980年3期。

⑫《有关报告文学的几个问题》，见《新闻业务》1965年8期。

⑬《致敏·考茨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⑭⑭《谈心》，见《湖北日报》1980年2月21日。

⑮《一封没有写完的信》，见《文汇月刊》1982年10期。